



# 《傣学研究丛书》

## 编委会

总策划：蔡四宏

顾问：龚敬政 刀安钜 孟必光 方吉龙 龚能政

编委会主任：蔡四宏

编委会副主任：刀晓瑞 岩 板

主 编：江晓林

副主编：蔡小晃 瑞 红 岳小保 相 亮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二软 尹宁华 馮 霄 江晓林 李 川 杨向宏

杨光远 杨进才 罕贞晓依 吞 静 岩 门 岳小保

孟成才 金光亮 相 亮 龚家强 龚锦文 散 孟

瑞 红 蔡小晃



# 总序

瑞丽试验区党委副书记、瑞丽市委书记  
瑞丽市中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蔡四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傣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傣族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傣族又是一个国际性民族，傣族历史文化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傣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现代傣族主要分布在泰国、老挝、中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等国，总人口约6500万人。其中，中国的傣族约120余万人，其分布地为澜沧江流域、红河流域和金沙江流域，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等地区。

虽然现代傣族各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家，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共同性（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审美情趣等）实际上是一个包涵了很多不同族群（支系）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居住在泰国、越南、柬埔寨的称为泰族，居住在老挝的称为老族，居住在中国的称为傣

族，居住在缅甸的称为掸族，居住在印度的称为阿洪族，但其自称皆为傣或泰（发音介于dai-tai之间），其族源均源于古百越族系，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台语支，大都信仰南传佛教（除居住在红河流域少数佛教尚未传入的地区外）。低纬度、低海拔的临水区域是傣族分布地的主要特点，稻作是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文身、饰齿、干栏式建筑都是傣民族古老的习尚。

当然，居住在各地的傣族有各种不同的自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但其共同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以中国傣族的文字为例，中国傣族文字皆为拼音文字，源于印度巴利文，有傣那文（通行于德宏一带）、傣泐文（通行于西双版纳）、傣瑞文（通行于金平一带）和傣绷文（通行于瑞丽、澜沧、耿马一带）四种，傣那文由緬文演变而来，傣泐文由泰北兰那文演变而来，傣绷文与缅甸傣文基本相同，傣瑞文与越南莱州傣文相似。我们从这种差异中，更多的是看到中国傣族文字与周边国家傣族的密切联系。

傣学（即泰学）是研究傣族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民俗、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我国的傣学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的《竹书纪年》《尚书》《国语》《逸周书》《春秋左传》《楚辞》《墨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文献中就有大量关于傣族先民百越族系的记述。《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居住在金沙江沿岸的古代部族）……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则是最早记述今天德宏及其邻近地傣族的文献。自汉以降，记述、研究傣族的著述可谓史不绝书。自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开创了中国傣学研究的崭新阶段。二三十年代，我国一批著名学者对中国傣族地区进行多学科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古生物学、生物学、气象学、水力学、农学、医药学、土壤地质学等许多学科。50年代，对中国傣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出版了一大批调查资料；开展了对傣族诗歌、民谣、文字、历史文献的翻译研究。“文革”时期中国傣学研究被迫停止。80年代以后，我国的傣学研究重获生机

并得到较快发展，各地纷纷成立傣学会（云南傣学会、德宏傣学会、西双版纳傣学会、瑞丽市傣学会等等），傣学研究人员对丰富的傣文文献和民间传说做了大量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

我国傣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傣族，同时对南亚、东南亚傣族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丰富的汉文典籍、傣文文献和至今仍流传在傣族民间的丰富的传说、故事，是中国傣学研究的巨大宝藏，加之悠久的傣学研究传统，越来越被重视的傣族口述史，不断健全的研究机构，这是中国傣学研究的特色，也是中国傣学研究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为我们在新时期开展民族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瑞丽市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开展傣学研究、编辑出版“傣学研究丛书”，其目的有四：一是通过对傣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继承、弘扬傣族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切实做好傣学的研究和传承工作。

二是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中共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傣学研究要围绕“民族文化强省”这个目标，认真开展傣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多出精品力作。

三是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服务。傣学研究要围绕试验区建设这个中心，借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股强劲东风，深入挖掘“乘象国”和“勐卯古文化”等民族文化资源，努力打造国际文化交流窗口，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是为中国和海外的傣学研究者构建一个共同研究、相互交流的平台，期待有更多海内外学者关注傣民族，加入到傣学研究队伍中来。为此，“傣学研究丛书”关注傣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对重大课题、空白领域的研究成果；组织力量对傣族重要典籍进行挖掘、整理、翻译；重新出版现今很难找到的重要论著；推出国外学者有影响的著作。我们不以一己的观点为“丛书”选题设置门槛，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

“傣学研究丛书”仅是傣学研究学术成果中的沧海一粟，我们期待它能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瑞丽市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仅一年，各项工作尚在起步阶段，丛书中错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专家和读者见谅并指正。

我们坚信，在中共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傣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傣学研究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进而为国际傣学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傣学研究硕果累累，傣民族繁荣昌盛是我们的最大愿景！

2014年8月

# 序

江晓林

## 一

有清一代，云南诸多地方志和私人著述中有关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记述异常丰富，究其源，开风气之先的，当推明朝天启间刘文徵《滇志》和清朝乾隆间傅恒《皇清职贡图》二书。

天启《滇志》是明代以及明以前云南志书中纪事最为完备的一部，成书之后备受学术界重视，方国瑜先生说：“以纂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中最完善之本也。”对境内外各少数民族的重视，对“土司官氏”“属夷”“缅甸始末”“外传”“种人”设专篇记述，是《滇志》的一大特点，受其影响，此后整个清代，云南所编撰的省、府、州、县志，都关注到所辖区域的“种人”，给我们留下了云南古代民族种别、名称、居所、生产、生活、风俗等的珍贵资料。

乾隆《皇清职贡图》则是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各“种人”及海外诸国民族状貌，并有文字题记，简要说明其分布地区、历史、社会、生产以及向清朝贡赋的情况。此后一个多世纪，描绘、记述云南诸民族之人物状貌、服饰、习俗及生产生活场景的“图说”类著述颇丰，这类典籍，以绘图的形式具象描摹为主，附有简要的文字题记，介绍其分布地区、历史沿革、生活状况、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在前摄影技术时代产生的这些图画史料，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史、地方史价值。



清代云南的各种方志、图说中描绘的诸少数民族，被称为“种人”，所谓“种人”，不同于今天学术上频繁出现的“民族”这一术语和概念，对居住于同一地域的人群，他们在服饰、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有异于周边其他人群，都被视为一种“种人”，因而这些记述“种人”的文献典籍，是从一个比民族更小、更具体、更细微的视角，记录了居住云南诸族中一个个特殊群体的生存情状。对这些“种人”究竟属于今天哪一个民族，大多已经清楚，但研究尚未最后完成，对有的“种人”，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看法，有的尚不清楚应归属何种民族。

我们知道，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源于百越族系的傣族，其历史可追溯到殷周时期，百越族系共同的文化特征是：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又称为侗台语族台语支），能制造发达的几何纹陶器，有卓越的青铜冶炼技术，擅长特色鲜明的纺织品，建盖干栏式建筑，稻作，捕鱼，习水性，善操舟，善编制竹器，断发文身，饰齿，喜食昆虫等异物。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古百越形成现代的傣、泰、壮、布依、老、掸等族，分布在中国及南亚、东南亚的广袤区域内。

就傣族言，从汉代起，汉文典籍记述颇丰，可谓史不绝书。对傣族先民的称谓历代各有不同，就是同一时代，对傣族先民也有多种称谓，清代是现代傣族形成的前夕，今天傣族的主体已经形成，当时称为“摆夷”<sup>①</sup>的“种人”，可以确认就是今天的傣族，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而对住居云南境内傣语族系的其他“种人”的认定，我们主要从这样几方面作综合考虑：居住在清代云南境内百越民族分布的区域，具有百越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与百越民族历史上的称谓相一致者。例

<sup>①</sup> 摆夷，又称为“摆彝”“白夷”“百夷”、“白衣”“焚夷”“焚彝”“焚”“焚人”“伯彝”“伯夷”“大伯夷”“小伯夷”“水摆夷”“早摆夷”“花摆夷”“金齿”“漆齿”“绣面蛮”“花脚蛮”“花角蛮”等等，这么多的称谓，大量是同音异字或近音异字，也有沿用元、明时的称谓，再加上带“犛”旁的歧视性的生造字，有二十余种之多。其中“焚”“焚夷”“焚人”等称谓，有的指现代的傣族，有的指现代的白族，更须认真分析辨别。

如“普特”，今天这样称谓的“种人”已经消失，已经不可能去做田野考察，而有关“普特”的文献记载仅有几则，只能根据百越民族“捕鱼”“习水性”的特点，并从其称谓中的“普”推断是“蒲”“濮”的同音异字，将普特归入傣语族系。

清代，“摆夷”及其他傣语族系的“种人”依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融合、分化的历史进程中，而形成现代几个不同的民族。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最终融入傣族，形成现代的傣民族。如“土獠”“羿子”“黑濮”，以及从老挝迁入云南境内的“老挝”，越南迁入云南境内的“交人”，缅甸迁入云南境内的“绷子”“莽人”“戈罗”“良子”等等。

二、最终融入壮族，形成现代的壮民族，如“侬人”。

三、最终形成现代的布依民族和壮民族，如“狃人”。

四、根据其住居区域的不同，最终分别融入现代傣、壮等傣语族系民族，如“沙人”“沙兔”等。

五、最后融入聚居地域的主体民族中。如“向莽子”“普特”等。

## 二

清代云南诸民族的信息大量出现在方志和图说中，受上述二书的影响还仅只是表层的原因，更本质、更深层次的原因要从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层面来解读。自元代起，云南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历元、明两朝三百年，云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渐密切，作为多民族中央大国一个省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已深入人心，而云南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也让中央政权需要加强对云南情势的了解，这也正是天启《滇志》以大量篇幅记述云南边疆民族的内在原因。

清代的云南，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阶段，自顺治始，清政府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大大改变了云南广大区域以往的政权、社会格局，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

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改土归流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吏治、文化、民族诸问题的系统工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为此，清廷对改土归流的推行也不是一刀切，一蹴而就，到雍正年间对云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时，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原则是“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江”，指澜沧江。解决了哪些地方要废土设流，哪些地方仍保留土司制度的原则，全省除西部到西南部的一个弧形地带外（大致是今天德宏一带地，临沧的耿马、沧源，普洱的孟连及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得以保留外，其余地方均改土设流，归入改土归流的地区中，也涉及到许多傣语族系民族。

新设流官的地方如何管理？保存土司的地方怎样羁縻？头绪纷繁，问题层出。这种由封建朝廷推行的，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自然更多地着眼于清王朝的利益。长期以来的压迫与剥削，对少数民族的欺凌和歧视，地方官吏的贪墨和盘剥，这种种的积怨，因改土归流的震荡而爆发出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起义频频发生，民族问题异常突出。到嘉庆年间，云南各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起义的规模由过去局限于个别府、州、县的个别民族，发展到动辄涉及几个乃至十几个州、县的广大地域和多个民族，起义人数大都在万人以上，起义爆发的地方，不仅仅局限于改土归流地区，在流官统治的腹心地区，民族起义也此起彼伏。仅嘉庆一朝，据史籍所记载，规模较大的民族起义，范围几乎遍及云南全省<sup>①</sup>。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红河元阳哈尼族高罗衣起义，发展迅猛，声势浩大，打败纳楼土司，杀死稿吾土目，直逼临安府。起义军人数由开始的七八百，迅速扩展到一万六千余人。清朝廷急命总督伯麟率云

<sup>①</sup> 据《清实录》、《清史稿》、《滇系》、道光《云南通志》载，仅嘉庆年间云南民族起义有：嘉庆元年至十八年临沧一带拉祜族、佯族等民族此起彼伏的起义；嘉庆二年罗平、师宗的苗族、彝族、汉族起义；同年大理、楚雄的白族、彝族、回族、汉族起义；嘉庆六至八年维西的傣族、彝族起义；嘉庆二十二年红河哈尼族高罗衣起义；嘉庆二十三年红河哈尼族高老五起义等。

南、贵州军队和广南土司兵前往征讨。面临起义军的燎原之势，嘉庆皇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责令伯麟将有关军情由“三百里具奏”改为“五百里驰递”，又改为“六百里驰奏”<sup>①</sup>。由于事发突然，以至猝不及防的伯麟奉命亲率大军离昆明前往滇南镇压后，到了“省城无大员弹压”的地步<sup>②</sup>。要消弥、化解日见激烈的矛盾，民族问题愈显重要。认识云南全省各民族的构成、分布、习性等基本特征，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成为摆在清廷和云南统治者面前刻不容缓的课题，这才是清代嘉庆后记述和描绘云南少数民族著作备受重视的根本原因。

### 三

本书图部所用清代描绘云南傣语族系图画典籍十二种，得图共一百六十八帧，分别简述如下：

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滇夷图说》，成书于康熙年间，编绘者佚名，彩绘绢本，高38厘米，宽38厘米。《滇夷图说》“图”“说”分离，不在一个页面上。共四十七种，得傣语族系种人六种，说部文字未能找到。据宋光宇撰辑《华南边疆民族图录》。台北1991年版。

二、乾隆《皇清职贡图》，傅恒编撰，其目的是为乾隆歌功颂德，“以昭王会之盛”。原书有设色本和白描本两种，本书引用的是白描本，书中所绘云南傣语族系种人八种，图十六帧。《皇清职贡图》“图”“说”分离，不在一个页面上。该书对之后云南诸种图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以“种人”为类别，“有图有说”的创作形式。据辽沈书社1991年版。

三、故宫博物院古籍特藏部藏：《普洱夷人图说》，杨遇春嘉庆三年于“普洱军次”编辑成书。杨遇春，四川崇庆人，嘉庆间曾任云南

<sup>①</sup>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三二八》。

<sup>②</sup> 《陈若霖奏折》，转引自《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三二八》。

都司，道光时官至陕甘总督。据他在序言中说，“汇得四十五种，爰命丹青绘辑成图”，绘图者未能留下姓名。此书依《皇清职贡图》形式，“图”“说”分离，右“图”左“说”。设色纸本，图版长39.2厘米，宽30.9厘米。现存四十帧，可知为残本。四十种“种人”里，傣语族系“种人”七种。据赵荔《清代〈普洱夷人图说〉研究》所附图片。

《普洱夷人图说》一名并非原书名称，而是《故宫善本库存目录》编者所定，从杨遇春序言所述看，所谓“外域不与焉”，应指云南之外的贵州，且书中所记述的古宗、佻人、怒子、西番、桥头人等“种人”，从未居住在普洱境内，此书原名似应标以“云南”，而非“普洱”，但本书仍依照《故宫善本库存目录》所定书名，不做改动。

该书与《皇清职贡图》最大的差别是：编绘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寰宇一统”的“盛世景象”，杨遇春在“序言”中说“凡蒞滇有民责者，亦可按图索考，思所在以治安而抚驭之……为有助于治术也”很明白，目的在于了解民族情状，以解决实际问题。

四、江晓林藏：《云南种人图说》白描定稿本，嘉庆二十三年李祐编绘，纸本，高32.5厘米，宽26.6厘米。据道光《云南通志稿》、道光《昆明县志》记载，嘉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伯麟聘请著名画家李祐（字仰亭）主持编绘，次年书成，“神采酷肖”，“称善本”。伯麟誉之为“安内……攘外要图”。<sup>①</sup>

李祐本《云南种人图说》改变了《皇清职贡图》和杨遇春《普洱夷人图说》“图”“说”分离的形式，把文字记述和图画描绘安排一个画幅里，使每一幅画更为完整和统一。现存白描本为散页形式，经考证，是正式绘制设色本前的白描定稿本，无作者署名及印章，每一幅上均有伯麟等人朱砂圈点选定的标记，是符合白描稿送交审批的惯例的。现存画稿不是全本，缺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曲靖府、广南府、顺宁府五府（州）的种人，记述云南种人一百一十九种，是已知清代图说类典籍中收绘种人最多

<sup>①</sup> 伯麟：《进〈云南种人图说〉》，见道光《云南通志·卷三百八·艺文志四十二·杂著十二·说》。

的一部。

李祜创作的这部云南民族风情巨著的书名，历来说法不一，道光《云南通志稿》称之《夷人舆地图》，道光《昆明县志》叫作《诸夷人图》，马曜《云南简史》名为《滇南夷情集汇图册》，还有称为《伯麟图说》的。当年云贵总督伯麟将此书完成本呈献给清廷的奏折，开宗明义曰“进《云南种人图说》”，这是最早、也是最确切的名称，当以此为是。

《云南种人图说》创作的缘由清楚，创作年代及作者明确，记述描绘种人最多，其学术价值、艺术造诣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迄今所发现的清代云南图说类典籍中，多数是李祜《云南种人图说》中部分画作的摹本、改绘本，而绘画技巧均逊于李祜原作，因此，李祜本无疑是清代云南民族图说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但此书设色定稿本已逸散，这部白描本亦弥足珍贵了。书中所绘种人一百一十九种，其中傣语族系种人图三十二帧。

五、江晓林藏：《云南种人图说》设色本（两帧），嘉庆二十三年李祜编绘，纸本，高31.8厘米，宽24.2厘米，蝴蝶装。这是逸散的正式设色本《云南种人图说》仅存的两帧，皆盖有作者印章，其构图与白描本相对应的画稿一致，而精美则远胜于白描本。其中傣语族系种人一帧。

六、王崧《道光云南通志稿·种人志》中种人图画，采自李祜《云南种人图说》，因雕版印刷困难而略去场景，减少人物，其中傣语族系种人共三十四帧。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云南种人图说》，光绪十八年□世昌录本，纸质设色本，“图”“说”分离，共二十二帧，其中傣语族系种人九帧。据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八、董路明藏：《古滇土人图志》，宣统间董贯之绘，系钢笔画。原画绘有风俗图十二帧，种人头像三十四幅，民国三年有石印本刊行，2013年由云南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董路明先生系董贯之长孙，藏有乃祖父原稿，许我翻拍，得傣语族系图十一帧。

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滇省夷人图说》，年代与作者无考，设色纸本，共一百零八帧，其构图与《云南种人图说》

清代云南傣语族系种人图志  
一一一

白描定稿本一致，有学者认为系李祐《云南种人图说》的摹本或改绘本，所见甚是。一百零八帧中，得傣语族系种人图二十七帧。据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多种“云南民族图说”，年代与作者均无考，原作装帧、形式、尺寸、是否成册等情况均不明。从李泽奉、刘如仲编撰《清代民族图志》一书中得傣语族系种人十帧。据青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十一、云南省博物馆藏：《普洱府图说》，尺寸不详，年代与作者无考，设色纸本十二帧。原为册页，后装裱为四立轴，得傣语族系种人八帧。据熊丽芬《从普洱府图说看清代当地民族风俗》，载《收藏家》2011年9、10期。

十二、云南省博物馆藏：《骑象图》，长轴，尺寸不详，作者及年代无考，绘制精美，从图中驯象、文身、服饰等可确认系傣语族系种人。据《中国博物馆丛书》第十卷《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此外，国内已知清代有关云南种人图说的典籍中录绘有傣语族系种人的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南夷情汇集》108帧，年代及作者无考；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藏《御治外苗图》104帧，年代及作者无考；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藏《云南三迤百蛮图》108帧，年代及作者无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夷人图说》（有说无图）108种，年代及作者无考。以上四部书籍，均仿自李祐《云南种人图说》，本书不再一一赘引。

海外藏本有英国威尔康图书馆藏《云南营制苗蛮图册》，赵九洲编撰，成书应在乾隆三十五年前，彩绘本，收种人六十七种；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藏《滇省西南诸夷图说》（亦名《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乾隆五十三年，贺长庚编撰，彩绘本；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藏“苗图”之一，收108帧；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等。上述海外藏本均绘有傣语族系种人图，但无法得到原图图片，只能阙如了。

对清代云南诸种“种人图说”作对照分析，很容易便可发现，除《皇清职贡图》和《古滇土人图志》二书外，多种图说所绘同一种种人，构图多所相似，其所本，是明代无名氏编绘的《云南诸夷图》。清初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一书对明本《云南诸夷图》有所记述。

李孝友先生引述道：“佚名所绘《云南诸夷图》一卷，对明朝初年云南境内三十七种民族的部落、种类、居处、生性、学佛、渔猎、农耕及贸易等情况作了描绘简介。此书在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由云南左布政使殷序（字序宾，江苏无锡人）所收藏，并呈请黔国公沐晟资助钤版印行传世。明世宗嘉靖年间，浙江遂昌人黄中字（字文卿）来云南做巡按御史，访到此书，据之对云南少数民族做了一定研究，编有《民风图》，藏之巡按察院。到了明神宗万历时，云南巡抚陈用宾搜访得此书后，曾影写装帧成册进呈大内。历时二百余年，至清乾隆、嘉庆年间，《云南诸夷图》已成稀世之本，仅昆明著名画家李沾（字仰亭）藏有原刻原印之本，珍若珙璧，秘不示人，到编绘《云南种人图说》时，也参照了明本《云南诸夷图》。”<sup>①</sup>

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早期诸种“图说”绘制时，宣德版《云南诸夷图》尚有存世，诸书大致都是明《云南诸夷图》的抄绘、改绘或增绘本。李祐编绘《云南种人图说》时，对《云南诸夷图》也多有借鉴，但李祐毕竟不是私家著述，而是受云贵总督委派编撰的，所以无论在现实文书档案的调阅，历史典籍的查寻，甚至实地考察等方面都有极大便利，其书描画、记述云南的种人种类远远超过以往诸书，在构图上，把该“种人”的生存环境、山川地貌、生产方式、生活场景、居室、服饰、工具等元素融汇到一帧画幅里，以传递更多该“种人”的信息。缜密精到的构思，再加之精湛的绘画技艺，故李祐《云南种人图说》一经问世，堪称空前，终清一代，亦无出其右者。后来种种，大都其流风余韵。

<sup>①</sup> 李孝友：《〈云南诸夷图、金筑白苗图〉序》，见《琅嬛著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四

古文献中对同一民族或种人的称谓很混乱，最为常见的情形是汉译时的同音异字或近音异字所造成，且在称谓用字上往往加“彡”旁，生造出一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性情的描述也常语含轻蔑，这是封建社会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铁证，也暴露了自己的无知、狂妄与自大。本书对引文中此类用字和语词，均保持原貌，不作删改，以确保史料的真实性、完整性。<sup>①</sup>粉饰或掩盖历史中的不光彩，无益于自身的进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教训。

古代民族识别颇为不易，许多问题至今学界看法不一，本书编撰无论取材、论述，定有不少谬误，特别希望得到诸贤的批评指教。

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文德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史研究所古永继教授、中国民族博物馆贺琛博士以及董路明先生，书中许多图片是他们提供的。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张海超副教授和广西贺州学院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院长李晓明博士，为笔者的研究帮助良多，提供线索，搜寻资料，对他们的无私帮助，特表衷心的感谢！

---

<sup>①</sup> 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云南种人图说》在出版时，对文字做了删节和处理，因看不到原作，故无法恢复原貌。